

## 《医方类聚》的考证,校勘与研究

盛增秀, 陳勇毅, 王 英

中國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 The Study of Yifangleiju(医方类聚) Revisions

Sheng Zeng Xiu, Chen Yong Yi, Wang Ying

China Zhejia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ifangleiju(医方类聚) is a collection of medical books that consists of 266 volumes. It is a very important set of data in studying ancient Asian medicine because it systematically organized the many medicine-related data of Eastern Asia. But it was never published again after its 30th volume was published in 1477, and only a single copy remains in Japan today. Because this book is valuable it has been republished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py in Japan. This study is a study of the many problems that occurred in the process of republishing Yifangleiju(医方类聚) in China.

**Key word** : traditional korean medicine, Yifangleiju(医方类聚), chosun dynasty medicine, korean ancient medicine, ancient medical text

《医方类聚》是一部卷帙浩瀚的大型中医类书,系朝鲜世宗时代金礼蒙等主要辑录我国明初以前的医学方书150余种编纂而成,距今已560余年。现存本全书凡266卷,分92门,每门按所录医籍的成书年代先后排列,首则汇集众书的医论,再按病症辑录各书中有关治法方药(含针灸,导引,食疗等)。全书约千万字,收方近6万个,其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内,外,妇,儿,伤,五官诸科和养生方面的知识和方法,还兼及道藏和佛书以及传记杂说等有关医药的记述,内涵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后人称其“虽《圣济总录》及明周定王朱橚《普济方》等,也不能望其项背”,洵非夸张之辞,允称至当之评。最为可贵的是,本书保存了我国许多亡佚的古医籍,为今人提供了大量可资查证的宝贵文献,其史料和学术价值非同寻常,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现就本书的有关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 一. 《医方类聚》的编写过程与版本流传

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医方类聚》的编纂历时三年,始于

世宗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告成(相当于我国明正统八年至十年,即公元1443~1445年),是由金礼蒙,柳诚源,闵普和等人负责和参加搜集及编纂。本书所搜罗的医籍,多系我国明初以前的重要医学方书,计150多种,金氏等按类书编写的体例,对各书加以分门别类,然后根据“以类相聚”的原则汇集成册,全书365卷,广辑医论,备载众方,堪称集我国汉唐宋元各家医著之大成者。书成之后,因“卷帙浩穰,卒难刊行”,一直拖到世祖五年才由梁诚之负责校正。至于本书的初刊年代,说法不一,一说是1465年(世祖十年),持这种观点的有《三百种医籍录》,《中医大辞典》和《中国医史医籍述要》等;一说是1477年(成宗八年),持这种观点的有车雄硕等撰“韩医学史现代研究概况”(《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4期242页)等。至今似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考证。可见本书的编纂至印行,颇费周折,来之不易。

《医方类聚》的朝鲜原刊本由于印数不多,后又因日朝战乱而濒临散佚。日人从朝鲜获得此书残本,学者喜多村士栗据其残本,倩人参考诸书加以补入,由丹波元坚作序(见《聚珍版医方类聚序》),遂于文久元年(相当于我国清咸丰十一年,即公元

1861年)江户学训堂仿朝鲜本活字排印。日刊本全书凡266卷(其中卷155, 156, 209, 220为翻刻时原阙), 虽较原刊本365卷为少, 但可以说保留了原书的大部分内容, 亦属珍本无疑。

日刊本《医方类聚》传入我国为数甚少, 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载, 仅存于北京大学, 中国中医研究院,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上海中医学院和天津市卫生职工医院五家图书馆, 虽互有缺失, 已是弥足珍贵的版本了。

我国现存《医方类聚》版本除上述日刊本外, 尚有《医方类聚》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1982年出版以及该社与日本株式会社雄浑社1982~1984年联合出版); 《医方类聚》重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出版); 《御修医方类聚》影印本(九州出版社2002年出版); 《医方类聚》电子版(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2002年出版)。

此外, 据称中国台湾和朝鲜, 韩国亦有《医方类聚》出版, 因未见其貌, 恕不缕述。

## 二. 《医方类聚》引用诸书中已佚者考证

如前所述, 《医方类聚》主要辑录我国明代以前重要医学方书达150余种, 其中不少医籍因岁月久远, 迭经风化虫蚀, 特别是由于战乱频仍, 在我国早已亡佚的达40余种, 兹择其要并有资料可查者考证如下:

### 千金月令

《新唐志》谓三卷, 佚。

丹波元胤《医籍考》载: 按朝鲜国《医方类聚》, 引有《千金月令》一书, 医官小岛学古尚质就以采辑, 得说一十九首, 方三百二十一首, 检其文义, 与《千金方》实出一手, 决非贗鼎矣。考《新唐志》农家类云: 孙氏《千金月令》三卷, 孙思邈撰, 殆此书也。而陶九成《说郛》卷第六十九载有其书, 仅举节物十三条, 盖是以时令为主, 因以及医方者。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 二卷一册。

### 神巧万全方

《幼幼新书》谓: “《万全方》, 刘元宾撰, 元宾字子仪, 号通真, 主邵州, 邵阳人。”《宋史艺文志》载本书为十二卷。丹波元胤《医籍考》按: “是书辑在《医方类聚》中, 弟坚尝为录出。跋曰: 上宋刘元宾子仪撰, 其方药采之《圣惠》者, 十居七八, 多可施用。其论说亦原本古人, 间加己见。至如其举伤寒各治, 辨中风诸证, 最为赅备, 颇有发明。奈何世久失传, 元明诸家, 罕征引者。今检《医方类聚》中所载, 按条掇拾, 虽未复旧观, 然大要略具矣。仍谨依类排纂, 详加订正。从《宋史》原目, 厘为十二卷云”。清同治《安福县志》曰刘元宾, 西乡人, 连举解试, 任潭州司理, 通阴阳医药术, 真实试之屡验, 赐名通真子,

所著有《集正历》, 《横天卦图》, 《神巧万全方》, 注解《叔和脉诀》, 《伤寒论》, 《洞天针灸经》(据《中国医籍通考》)。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十二卷六册。

### 简要济众方

《宋史》载: “皇祐三年五月乙亥, 颁《简要济众方》, 命州县长吏, 按方剂以救民疾”。《通志艺文略》谓: “简要济众方, 五卷, 周应等撰。”《玉海》云: “皇祐中, 仁宋谓辅臣曰: 外无善医。其令太医简《圣惠方》之要者, 颁下诸道, 仍敕长史拯济, 令医官使周应编, 三年颁行。”丹波元胤《医籍考》按: “按弟坚曰: 是书陈, 晁二氏并不著录, 惟唐慎微, 刘完素书引之, 而朝鲜国《医方类聚》载藏府一类。其方出《圣惠》者, 仅薏苡散, 酸枣仁丸, 硃砂丸三方, 余皆彼书所无, 不知何故也。平胃散一方, 世为出《局方》, 不知其本于是书, 自余诸方, 亦多可资用者矣”。苏东坡曾为其作序。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一卷一册。

### 王岳产书

《通志艺文略》载本书为一卷,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谓: “《王岳产书》一卷, 阙。”丹波元胤《医籍考》按: “是书久佚, 特朝鲜国《医方类聚》中所收, 殆为完璧, 弟坚录出, 以为一卷, 可谓发幽光于数百年溷晦之余。郑汝明《产经》跋曰: 衡阳宋居士云: 旧曰《王岳产经》, 湖南漕使陈云傅良亲跋于后, 今检《止齐集》不录其文, 《类聚》中亦失载”。

### 吴氏集验方

《宋艺文志》作“吴得夫集验方, 七卷”, 《跻寿馆医籍备考》, 《宝素堂藏书目录》均载本书为一卷, 谓“宋吴得夫撰”。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

### 疮科通玄论

《国史经籍志》谓本书三卷, 作者为杨得春。

### 胎产救急方

丹波元胤《医籍考》载本书为一卷, 并引本书自序云: “延年正心李辰拱, 壮岁游三山, 获从仁斋杨先生游, 气味相投, 因以《伤寒总括》见授, 且语之曰: 治杂病有方, 治伤寒有法, 一法既通, 其余可触类而长矣。来归旧隐, 乃取先生活人治例, 演而伸之, 编为《伤寒集成方法》。研精覃思, 三个余年, 方克成编。靖思先生所刊《活人总括》, 《直指方论》, 《医学真经》, 《婴儿证治》, 传施四方, 家传人诵, 独于胎产一科阙焉。遂采摭古今效验方书, 为《胎产救急方》, 板行施人, 以续先出未尽之仁。”

### 川玉集

《崇文总目辑释》,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 《宋史艺文志》均载本书为一卷, 不著撰人。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

### 小儿药证

《崇文总目辑释》, 《宋史艺文志》均载本书为一卷, 刘景裕

撰。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谓“宋·刘景裕撰”。

黎居士简易方

《文渊阁书目》载本书一部一册，已阙。《棗竹堂书目》载本书二册。《经籍访古志》记载本书为十一卷，宋于江水月黎民寿景仁撰。日本有写本一册。包悛作序曰：“今有迂江黎民寿，字景仁，智沉敏而思精密，学有师传，意兼自得，悟法之精，蓄方之众，试之辄效，信者弥众，争造其门，或就或请，日夜不得休，其全活迢续之滋多，而影响神应之可验，几有姚僧坦之遗风矣”。

保童秘要

《跻寿馆医籍备考》载本书为“二卷二册，金刘完素撰”。日本有《医方类聚》采辑本。

寿域神方

《明志》载本书为四卷，不著撰人。

运化云枢

《医籍考》引《绛云楼书目》载未见，亦不著撰人。

施圆端效方

《文渊阁书目》曰：“《端效方》，一部一册，阙”。丹波元胤《医籍考》按：“是书亦是《医方类聚》采辑本，弟坚缙象成编。”

断病提纲

《医学源流》曰：宋黎民寿，字景仁，宋景定中，参释氏，号黎居士，初注《玉函经》，后作《简易方》，《断病提纲》，《决脉精要》，俗谓之医学四书。

伤寒括要

《通志艺文略》载本书一卷，通真子撰。《直斋书录题解》谓：“通真子自言，尝为《伤寒括要》六十篇，其书未之见”。丹波元胤《医籍考》按：“刘元宾，自号通真子。是书以仲景旧论，裁为诗括，又以剩文为注，注中有所发明，朱氏《活人书》多袭其语。诗凡一百一十二篇，每篇七言四句，末附药方三十九道，收在于朝鲜国人所编《医方类聚》中。……弟坚从《类聚》中象出，厘为二卷”。

王氏集验方

《中国医籍考》载本书五卷，作者为王东野，并引吴澄“送王东野序”曰：古永新王氏执医伎，而东野始以发身，提领医官，自州而路，此至京师，因贵近人，其名遂得给事圣宫，游膺宠锡。徽政院请立广惠局以济民病，实自东野倡其议，被恩命，受同提举官，又升提举官，一时荣遇，有如此者。……家藏《集验方》，椀木以传。程文海“永新州医学祭祀记”曰：“大德初，王东野为吉安路永新州官医提领。七年，迁本路副提领。至大四年，赴调京师，改临江，未行。徽政院使罗司徒荐其名，兴圣宫命为太医”。丹波元胤《医籍考》按：“是书收辑在于朝鲜国《医方类聚》中，弟坚象出，以还原目。”

以上仅举例而已，其它佚书如《医林方》，《烟霞圣效方》，《澹轩方》等等，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缕述。

### 三.《医方类聚》的校勘

鉴于日本文久元年江户学训堂本《医方类聚》在内容和文字上存在着错，漏，衍，倒等的严重情况，为了提高本书的质量，对其进行校勘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在整理和编校《医方类聚》校点本和重校本时，原则上是采取近代陈垣先生提出的“四校”方法。所谓“四校”，即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一般说来，对校和他校最为常用，但古籍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单凭以上两法往往不足以胜任，须四校综合运用，解决问题才较全面。特别是校勘一些篇幅巨大的类书，因其引书浩博，涉及面广，常非四校合参不能为之，我们校勘《医方类聚》即是采取这种方法。

1. 对校要广搜版本，互校勘比：版本之优劣和多寡，对校勘质量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校勘《医方类聚》时，对其引用诸书，除注意选择现存善本和较优版本作为主校本外，同时还尽量多备副本，以供旁校之用。如《诸病源候论》，是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周氏医学丛书本为主校本，并以博文书局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二年）为旁校本；《寿亲养老新书》主校本为朱聚文斋刻本（清同治九年），旁校本为上海朝记书庄铅印本（1919年），等等。多贮版本有许多好处，特别当《医方类聚》本与主校本均有疑义或错讹时，旁校本常可弥补两者之不足，使悬案顿解，疑窦冰释；有时则起到互补兼通的作用。诚然，对校是以《医方类聚》与较本逐句对读，互校勘比，只要心细，一般是不难做到的。但我们决不能以此将对校理解为单纯的“死校”，事实上对校还涉及到版本的选择，以及数本互异时如何择善而从等复杂问题，所以它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2. 他校要多找资料，互补参证：我们在校勘《医方类聚》时，运用他校主要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国内已散佚而无法进行对校的引书，乃借助于其他校勘方法，其中他校尤为常用。这是因为，古代医籍往往相互传抄，同一内容可散见于多种的书籍，即使有些书籍已散佚或缺不全，但所遗缺的内容，有时可从其他书籍中找到相同或类似的资料，从而为校勘和补阙提供重要依据。如《医方类聚》卷一百二十四消渴门引《神巧万全方》云：“肾实则消而利是也。……利多则不渴濡养，五藏衰则生诸病。”其中“利多则不渴濡养”的“渴”字，显然于理难通。但《神巧万全方》已佚，故无校本可供查对。然则此段文意，亦见于其他书籍，如《巢氏病源·内消候》载：“利多不得濡养五藏，藏衰则生诸病。”于此不难佐证，“渴”字系

“得”字之误。又如同卷《澹寮方·消渴》云：“消渴病者，下泄为小便，皆精气不实于内，则小便数而澹溺也。”“澹溺”两字有乖文意，因《澹寮方》已佚，无从对校，但《普济本事方》有“小便数瘦弱”句，可见《澹寮方》“澹溺”两字，应作“瘦弱”，其义始通；二是当《医方类聚》本与校本均有疑义而难下定论时，借助他校常可使问题求得解决。如《医方类聚》卷三十八伤寒门引《伤寒直格》云：“阳明病，脉浮迟，汗出微怒寒……”。又云：“肾水阴虚，阳热暴甚，而僵作卒中。”以上两句中的“怒”和“作”字，显然有误。但校本《伤寒直格》与此无异。考《宣明论》“怒”作“恶”，“作”作“仆”，据此校勘，当合文理；三是凡其书有引自他书者，则以他书校之。古籍相互引证屡见不鲜，特别是《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经典中的内容，常被它书所引用。但古人引用文献，往往不是原文照录，而是撷取其大意。对此，校勘似不宜与所引文献逐字逐句校对，只要基本精神相符，即使具体文字有所出入，一般可不必校注，否则会出现校不胜校的现象。当然，如果由于文字不同而影响原著的基本精神时，则应予校勘。如《医方类聚》卷三十八伤寒门引《伤寒医鉴》云：“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肋，络于目，故胸肋痛而耳聋。”此语出自《素问·热论篇》，但引文中“目”字有悖经旨，故宗《素问》校正为“耳”字。又如《医方类聚》卷一百四十二泄泻门引《永类铃方》云：“若滑泄，尤忌五虚：脉细，皮寒，前后泄利，饮食不入。”这里所说的“五虚”，语出《素问·玉机真藏论》，原文为“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显然引文脱漏“气少”两字，理应校勘，始与经旨相符。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校勘中要高度重视类书的作用，这不仅因为类书引书广博，资料丰富，更重要的，它往往保存已佚古籍的部分内容，是他校的极好参考书。如《医方类聚》卷一百五十诸虚门引《简易方》载《究原方》大建中汤的主治，药物组成，加减法等，文学颇多执拗，但《简易方》和《究原方》两书均佚，故无从查对。而《普济方》卷二百十九诸虚门则引录了《究原方》的大建中汤，从而为校勘提供了重要依据。又如《医方类聚》卷一百五十诸虚门引《朱氏集验方》载“膈膈脐丸”，方中“沉香”重出，校本亦同。但《普济方》卷二百十九诸虚门引《朱氏集验方》“膈膈脐丸”，分别为“沉重”，“乳香”，千古疑窦，豁然开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有些重要的古医籍，如《外台秘要》、《本草纲目》等，纵不属类书的范畴，因其引录文献广博而真实，并能注明出处，且所引医籍不少已无传本，（如《外台》所引的《集验》，《小品方》等），因此常为校勘提供极为有益的资料。由此可见，他校必须多找资料，集思广益，才能更多更好的解决问题。

3. 本校要细寻线索，前后印证：本校是求证于书内的一种校勘方法，即根据本书的前后文义等方面细寻线索，从中发现问题，校正谬误。基于《医方类聚》前后内容重出，文字互见者不少，这就为本校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卷三十九伤寒门引《伤寒指掌图·伤寒赋》有“小承气正蠲潮热”句，其注文云：“汗后潮热，不恶寒，腹满而喘者，小青龙汤。”根据上文文义，小青龙汤显系“小承气汤”之误。不借助对校，他校，而直接根据本书的前后文义所作的校勘，是属本校的范围。运用本校必须要细心强记，综观前后，诚如《医古文基础》所指出的那样：“这就要求我们在读书时仔细从各个方面体会，做一番融会贯通的功夫，从而抽出规律性的条理来进行校勘。”

4. 理校要通识医理，以求其是：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这是对理校法恰如其分的论述。在校勘中当无校本可据，或各本互异而无所适从时，就需要运用理校法，于扑朔迷离中抉择是非。由此可见，理校最难，常非学识广博，通晓医理者，不能为之；理校宜慎，若草率从事，妄下结论，以不误为误，则贻害非浅。所以我们在运用此法时，对确认无疑的错讹，校注称：“某按文义应作某”；若不能即定其误者，则注云：“某按文义疑作某”，留有余地，以示郑重。如本书卷一百十七咳嗽门引《卫生十全方》治吐痰臭秽方载：“……以麦门冬，天门冬二件，去心，生地黄各三一两处捣。”文中“各三一两处捣”文义不通，应作“各三一两处捣”始合。又如同卷引《是斋医方》“治嗽”方，其中“甘草怀分一干”显属有误，按中药传统制法，应作“甘草怀干，一分”才对。这都是确认无疑的错讹。但如本书卷一百二十六水肿门引《神巧万全方·水病方论》云：“大抵诸肿俱属口治法去水补脾肾为得。”其中所脱之字，因无校本可查，只得运用理校法，但究脱何字？难下断语，故校注云：“按文义疑作水”，等等。

诚然通过校勘，使书中的错讹大多得到了纠正，缺漏大多得到了补充，篇目也得到了条理，从而使原书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但毋庸讳言，由于《医方类聚》引书极其广博，有些引书国内早已散佚，无校本可资校勘，因此在校勘中难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期望今后有新的文献资料发现而予以修正和补充。

#### 四、《医方类聚》的学术地位和应用价值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医方类聚》不仅保存了我国古代大量医籍，使之世代相传，免遭亡佚，更重要的还为古医籍整理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版本和参考文献。如今人欲校勘《诸病源候论》，《小儿药证直诀》，《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御药院方》及金元四大家著作等时，可根据《医方类聚》所辑录的相关文献，与其它版本进行校勘，颇有

助益。特别是如前面所述的我国明以前佚书赖《医方类聚》引录而得以保存者为数不少，这就为我们钩沉和辑佚古籍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和可靠的文献依据，使这些湮没沉沦的医籍得以再现，意义非同小可。国外学者如丹波元坚氏等曾从《医方类聚》中辑出已佚之书或借以校核的达20多种，丹波元胤称赞说：“可谓发幽光于数百年湮晦之余”。国内范行淮氏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在校点《医方类聚》的同时，对一些重要古籍，也进行了辑佚补阙，如宋严用和《济生方》，元萨谦斋《瑞竹堂经验方》，国内原流行本是从明《永乐大典》纂修入《四库全书》的。据《四库全书》载：《瑞竹堂经验方》“计亡阙已十之五六”，《济生方》亦散佚“十之三四”，而《医方类聚》引录两书的内容，远较四库全书本完整多。有鉴于此，我们自1978年开始，在深入调查，广搜资料的基础上，对上述两书进行辑佚补阙，历二年有余，编成了《重订严氏济生方》和《重订瑞竹堂经验方》两书。重订本在内容上大为充实，基本上恢复了原书的面貌。如《济生方》重订本与四库全书本相比，方剂从248首增到525首，共补充了277首；医论从56篇增至85篇，共补充了29篇。《瑞竹堂经验方》重订本与四库全书本相比，方剂从184首增至344首，共补充了160首，以上两书人民卫生出版社分别于1980年和1982年出版，得到了专家的较高评价，深受读者的欢迎。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像《医方类聚》这样的大型类书，确能给古籍的钩沉和辑佚提供珍贵资料和有益的线索，很值得重视。《医古文基础》说得好：“由于不少类书成书于古代，许多散亡的古籍往往赖以保存其一部分。……因此，这些类书又是辑佚、校勘的极好材料”。我们于此深有同感。

从医史角度来看，《医方类聚》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史料，特别是对于古代医林人物及其著述，据此而得到启示和增添新的内容，新的认识者，亦不在少数。如上文所述我国佚书中，苏东坡曾为《简要济众方》作序曰：“诏太医集名方，曰《简要济众》。凡五卷三册，镂板模印，以赐郡县，俾人得传录，用广极疗，意欲锡以康宁之福，跻之仁寿之域，已而县与律令同藏，殆愈一纪，穷达之民，莫或闻知，圣泽壅而不宣，吏之罪也”。又《黎居士简易方》包悛所作的序；《神巧万全方》辑佚本丹波元坚所作的跋（均见上）等，均为我国古代医林人物及其著作的考证提供了珍贵史料，其有补于医史当不言而喻的了。

从探讨方剂的源流来看，《医方类聚》可为我们提供有关线索，起到辨难释疑，发蒙解惑的作用，使不少古方的原始出处和流传情况得以“正本澄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如治疗表虚自汗，易感外邪的名方玉屏风散，对其出处，现代大致有二种说法：一是谓出自元·危亦林《世医得救方》（1337年），持这种观点的有《中医方剂学讲义》（中医学院试用教材，1964年版），《古今名方》（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新编中医方剂学》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二是近年有人鉴于《世医得效方》现行本未载此方，认为系元·朱震亨《丹溪心法》（1481年）方。《简明中医辞典》亦持此说。其实，在中医古籍中，先于《世医得效方》和《丹溪心法》就有玉屏风散的记载。我们在整理和校点《医方类聚》过程中，对此有新的发现。该书有关玉屏风散的记载凡二处：其一是引录宋《黎居士简易方》（1260年）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究原方》玉屏风散，治腠理不密，易于感冒，防风一两，黄芪蜜炙，白术各二两，上口父咀，每三钱重，水盏半，煎七分，去滓，食后热服”；其二是引录宋·陈自明《管见大全良方》（1237年）中亦有如下记述：“玉屏风散治男子妇人腠理不密，易感风邪，令人头目昏眩，甚则头痛项强，肩背拘倦，喷嚏不已，鼻流清涕，续续不止，经久不愈，宜服此药”。其药味组成和煎服法与《黎居士简易方》所载相同。从以上记述中，不难看出《究原方》当是目前我们发现记载玉屏风散的最早文献。盖《究原方》系宋代医家张松所撰，《宋以前医籍考》载录了张松的“自序”，张作序的年代为“嘉定六年”，即公元1213年，较之《世医得效方》和《丹溪心法》早一、二个世纪多。可惜《究原方》一书在我国早已散佚，难怪后人对本方的出处，只得以所能见到的较为晚出的医籍为据了，这不能不说是导致现代方剂著作对有些方剂原始出处记述失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例子，说明查考有关方剂的出处，必须重视像《医方类聚》这样的古代大型类书的作用，有些疑难问题，常可借助于类书而获得解决。

当然，最有意义的应该是《医方类聚》为当前的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和新药开发提供了极其丰厚，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在现实防病治病，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该书校点本出版发行后，使这部有重要学术和应用价值的医学巨著从长期束之高阁走进现代社会，不少医、教、研单位人员喜读此书，从中获得很多知识，受到很大启发。如眼科金针拨内障术，我们可以从本书所引《龙树菩萨眼论·开内障眼用针法》中，发现该技术的来龙去脉及施术方法，注意事项和术后将息等，更认识到现代在这种手术上有了重大改进和提高，从而深刻体会到中医学术须认真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中医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得到发展和提高，更好的为现实服务。又如《医方类聚》所载的方药，其应用价值不容低估，就拿疫病防治来说，书中所录圣散子，人参败毒散，辟瘟丹，神术散，普济消毒饮，藿香正气散，升麻葛根汤等等，对当前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疫病，有重要参考和实用价值，很值得深入研究，更值得指出的是，《医方类聚》校点本第九分册载录了古代许多养生保健，却病延年的方法，包括药物，针灸，吐纳，导引，按摩，食疗等，

很有特色,如引录《寿亲养老书》所载“擦涌泉穴”,“擦肾俞穴”等法,能增强体质,却病延年,且方法简便,至今沿用不衰。正因为《医方类聚》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古往今来,国内外引用其文献者甚众,如朝鲜宣祖太医许浚编辑的《东医宝鉴》,即引用《医方类聚》中大量文献;我国近年出版的《中医方剂辞典》,所收方剂出自《医方类聚》者,不胜枚举。其它如《养生寿老集》等书,不少原始资料亦得之《医方类聚》,足见其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 五.《医方类聚》的国际影响

我国是文明古国,曾对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文化作出重大贡献,中医中药尤为突出。成书于560多年前的《医方类聚》,收录我国医籍竟达150余种,涉及中药,针灸,推拿,导引等多种医疗技术,说明我国古代医学早已传入朝鲜,对该国的医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再由朝鲜传日本,并在日本重新印行,其对日本汉医的形成和发展,无疑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医方类聚》辑录了我国已佚古医籍达40多种,这对我国中医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由此可见,上述各国自古以来医学交流就非常活跃,互通有无,彼此促进,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仍闪耀着光芒。更值得一提的是,《医方类聚》(校点本)不仅在国内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还与日本株式会社雄浑社联合在日本出版,这对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文化和医学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朝鲜和日本学者来我院参观访问,当他们看到重新整理后出版的《医方类聚》时,深为该国与中国的医学交流所感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医方类聚》(重校本)出版后,一定会受到国内乃至世界医学界的欢迎。

## 六.如何正确对待《医方类聚》中所存在的问题

中医古籍,包括《医方类聚》,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往往金沙夹杂,鱼龙混同,即在大量精华中,难免掺杂着某些糟粕,并非句句金玉,字字玑珠,有的是荆山之璞需要反复琢磨才能放出光彩,也有的是历史尘土需要加以扬弃,但这并不影响其光辉灿烂的主流。所以我们对待祖国医学遗产,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充分肯定其伟大成就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不足和缺点之处。对古代医学文献不敢分析,明明看出问题也不予怀疑,无批判地全盘加以接受,显然会阻碍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若只抓住古代中医文献中不合理,不科学的成分,不分主流和支流,一叶障目,看不到祖国医学的伟大宝库,因而轻视甚至反对整理研究,那是十分有害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祖国医学文献作全面中肯的评价,尊重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大贬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正确的科学态度。

精华和糟粕的判断,不能凭主观想象,而是要依据客观的医疗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就《医方类聚》来说,本书精华部分是主要的,但也夹杂着一些封建迷信和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内容,如有的宣扬因果报应和荒诞不经的怪异之说;有的把妇女与鸡犬相提并论,提倡男尊女卑;有的还包含淫秽成分,这些显然是不合理的,应予扬弃。但古代医学文献,其精华与糟粕有时不易辨情,如不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是难淘真金的,有时甚至把精华的东西当作糟粕而予以丢弃,造成损失。因此,在如何区别精华和糟粕问题上,我们应该持严肃郑重态度,切勿掉以轻心。目前在古医籍整理中,对如何认识和处理“糟粕”问题,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干脆删掉,或作部分删节;有的则不赞同删节,以保存古书的原貌。我们在这次重校时,对原书的内容不作删节,完全保存其原貌。特别是对于一些一时搞不清楚,解释不了,是非难以判断的内容,不任意删节。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往往有局限性,科学也在不断发展,今天解释不了的并不意味着明天也不能解释,还是让它保留为妥,再由实践来检验,证明其正确与否。

众所周知,任何重大科学成就都是在继承前人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综合前人有关成果,分析其已达到的水平及其存在的问题,是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分段之一。《医方类聚》这部巨著,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只要我们认真学习,细致分析,重视继承,着力创新,一定能在前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有所前进。重新出版《医方类聚》的目的和意义,即在于此。